

新  
火  
编

谢纪锋 主编  
刘广和



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

# 薪 火 编

谢纪锋  
刘广和 主编

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

## 前 言

《薪火编》是为祝贺俞叔迟(敏)师八秩大寿而编辑的论文集。论文集的稿子刚刚收齐,被祝贺者的睿智的头脑就停止了思维,咽尽了血的心停止了跳动,纯净的灵魂乘取夏日罡风飞升于太清,驾临虚位的太白。先生生前就把世事看得很淡,这一走,就更彻底地摆脱了俗事的羁绊,就可以一心一意地与陈搏手谈了。

先生走得非常安然。在生命的黄金时间里,不可抗拒的政治灾难剥夺了他治学、育人的权力。但在允许的情况下,在有限的时间里,他以十分的热情,百倍的努力,千人不及的智慧,填补语言学领域一块块空白之地,为语言学界留下一座又一座丰碑。给予他从事学术活动的生命是短暂的,但他对学术界的贡献是巨大的。他无愧于大师的称号。

先生走得非常匆促。对身后事没有做一句、甚至一字交待,就匆匆上路了。在先生的头脑中,还有很多惊世骇俗的见解没能形诸文字,满腹经纶还没来得及向弟子逐一传授,舒心适意的晚年生活才刚刚开始。这一切,在先生看来都不重要。因为已有的著述已足以开宗立派,已教授弟子的知识足够其自修深造。至于一心纳福,本来就不是先生刻意追求的。

先生走得非常快乐。先生晚年看到自己的儿女品行端正、奋力向上,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;“三个火枪手”(先生生前称自己的三个孙子)一个个生龙活虎,具备了不畏艰险、勇往直前的意志;弟子们不违师命,收获自己辛勤耕耘的成果。先生感到非常欣慰。

然而先生无法知道,他这一走,给多少活着的人留下巨大的哀痛!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界,痛失一位泰斗;先生的老友,痛失切磋学术、促膝谈心的伙伴;先生的弟子,痛失解难释疑的导师;先生的

夫人，痛失甘苦与共、心心相印的知音；先生的儿女，痛失抚育自己成人的慈祥的父亲。这些悲痛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：先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

这本论文集是弟子们倡导编辑的，书名是先生亲自确定的。显然，书名取义于“薪尽火传”这一成语。由此可以窥知先生的用意：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发扬光大。这里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，先生提名邀请几位朋友为《薪火编》撰写论文。先生这样做，我想至少有两层深意：一是所传之火，可以是先生亲自点燃之火，也可以是各家各派之火，只要是科学之火，都应该一代一代传下去；二是传火之人，可以是先生的及门弟子，也可以是有志于先生学说的同好。由此可以看出先生胸怀的博大，可以看出先生对学术的追求甚于自己的生命。但愿先生的弟子及同好，能把先生珍视的科学之火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

由于书稿即将付梓之际，先生突然长行西去，祝寿论文集不禁蒙上了纪念论文集的色彩。为不改变先生初衷，此书仍为祝寿论文集，所收论文篇目均系先生生前所定。为表示对先生逝世的哀悼，师母奉献出50多年前所作散文诗《假如我是一个男子》，作为此书代序。另外，作为附录，收入鲁国尧先生的《学术者，天下之公器——悼俞叔迟先生》一文；先生的忘年交刘士励先生从美国康州致师母的慰问信以及《俞敏教授生平》一文。

论文集主要由广和兄和我编辑，而出版则仰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和福平兄。先生的长子达、次子宁，为此书的出版提供了赞助，弟子们也略尽绵薄之力。

我秉承先生的遗愿和师母的嘱托，把书稿收齐送交出版社，并写下了上面的话。缅怀思念之情不能表达万一，但愿以后有机会详尽地抒写先生对我的哺育之情。

受业弟子谢纪锋谨识

1995年8月

# 假如我是一个男子

## (代序)

杨藻清

假如我是一个男子，我一定要骑着一匹骏马，奔驰在辽阔的草原，阳光照我，轻风拂我，我是一个美丽的少年，满怀欢畅，驰骋在无垠的草原。

乌云滚滚，狂风怒卷，我坐稳我的坐骑，握紧手中的马缰，向着那远处明灭的火光，迎着风暴与我的马儿协力挣扎向前。我是一个英俊的少年，跃马奔驰在这黑沉沉的苍凉的草原。

假如我是一个男子，我一定要驾着一只小船，航行在碧波万顷的大海，看海上日出，听海鸥轻啼……扬起船上的白帆，划开金光闪烁的波光，破浪向前。

当海浪喧嚣，暴雨来临，我要沉着，别怕葬身于怒涛，为了生命，为了自救，我要做一个勇敢的少年，与汹涌的大海搏斗，在狂风激浪中颠簸，沉浮……

假如我是个男子，我决不爱那矫揉造作的女郎，我喜欢纯朴与善良。看那茅檐下、绿荫旁，站着一个衣着朴素的姑娘。她面目可亲，神态安详，诚实可信，是一个好姑娘。我要引她为同伴，与她同生共死，去到那遥远的地方。和她一起歌唱，歌唱那灿烂的朝阳，歌唱那人类的同情，人性的善良。

假如我是一个男子……

不幸我是个女子，一个可笑可怜的姑娘。我母亲生了七个这样的家伙，受尽了白眼，受尽了凄惶……

我是一个女子，一个自重自爱的姑娘，我厌恶虚伪与狡诈，嫌

弃那势利与炎凉；热爱同情与善良。我爱看那白云飘浮，爱听那泉水叮啷，喜欢小鸟在天空自由地飞翔，羡慕那山花遍岭开放……白发慈祥的老人，满脸天真的孩童，我要把他们揽入我的怀抱。

那纯朴的山乡，翠绿的山岗，那清澈的溪流，嘻笑的牧童，弯角的水牛。那阳光，那微风，那夕照，那晚霞；那月夜，那草房……蕴含着和平，包藏着善良，充满天地间诚挚的爱……我要把这一切放在我的心上。有人说我冷若冰霜，实在我热情满腔。任世人去评讲。我只爱我所爱的，做我所应该做的，我的生命像星星一样，在黑夜里闪光。

附志：谨以1946年青年时期在台湾所写仅存唯一诗篇献给我的同事、我的导师、我的朋友、我的丈夫俞敏。

沉重的劳动，深沉的忧愤摧毁了你武术师般的身体，如今晚年的勤奋和尽责，身体日渐衰弱。四大分解了，灵魂请暂住我的体内吧，近年来我坚持锻炼，小小的躯体还能承载得起两颗灵魂。愿你的智慧重新照亮我麻木的心灵，愿你的意志再次振作我的精神，两人从此永远合二为一，不再分离。愿你我仁爱的心灵永不泯灭，即使一起化为灰尘，也要滋润干渴的土地，遍绿丛林大地。你我永远同在，同生！

# 目 录

前言	谢纪锋(1)
假如我是一个男子(代序)	杨藻清(1)
读《俞敏语言学论文集》	王宗炎(1)
30年代青年语言学家——白涤洲	曹述敬(9)
《康熙字典》注音中的时音反映 ——声母部分	邵荣芬(20)
兼类问题	胡明扬(41)
远古汉语的词类系统	郭锡良(63)
关于黄侃古音学“乞贷论证” 问题的思考	李思敬(85)
元代汉语的标准音	杨耐思(96)
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和问题	瞿霭堂(108)
徐邈反切系统里的等和介音	蒋希文(126)
《淮南》语词札记	黎良军(138)
汉语恩施话与土家话相互影响初探	龙庄伟(154)
俞敏先生论及的南阳方音的几个特征	聂振强(166)
关于日语中汉字不同、假名相同的词语的分析	陈  绂(177)
他方之“辞”，可以破“格”：试论西方修辞学 的洋为中用	俞  宁(195)
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韵母系统	刘广和(217)
有关汉语和藏语比较研究的几个 问题	施向东(235)
师大馆藏《转注新考》考辨	崔枢华(248)

天息灾译著的梵汉对音研究与宋初语音系统·····	张福平(264)
施护译音研究·····	储泰松(340)
《汉书》颜氏音切校议(续)·····	谢纪锋(365)

## 附录

纪念亡友·····	孙崇义
“学术者,天下公器”——悼俞叔迟先生·····	鲁国尧
从美国康州致师母的慰问信·····	刘士勋
俞敏教授生平·····	俞敏教授治丧领导小组



# 读《俞敏语言学论文集》

王宗炎

暑假有空，我读了《俞敏语言学论文集》(下文简称 YA)和《俞敏语言学论文二集》(下文简称 YB)。著者的看法，大多数我支持甚至欣赏，少数我怀疑甚至反对，下头将分别陈述。但是我是粤语区人，著者所谈的北京话语音语法特点我摸不清；我学力不足，著者所讨论的某些专门问题我也插不上嘴。所以本文只是一份有选择性的读书报告，并不是全面的有自信心的评论文章。

—

在两本书中，著者给我的印象头一点是知识广博。在几十篇论文里边，他探索了这么些问题：(1)普通语言学的一些理论，(2)语言与文字的关系，(3)汉语与印欧语的异同，(4)汉藏语同源字谱，(5)现代汉语的各种方言，(6)古汉语的文字、音韵、词汇，等等，等等。他的研究领域辽阔无边，恍如秦始皇那个帝国。

著者另一个特点是态度严谨。对于好些问题，他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。他不轻易相信权威学者的判断——也不轻易否定别人的主张。为了弄清什么是一个词，他把总共有—万个音缀的北京口语翻成拼音文字，分门别类，反复掂量(YA89~106页)。对于自己的师友如罗常培、陆志韦、高名凯、王力等人的著作，他的评论总是坦率、严格、客观、公正的。

著者还有一个特长——观察细密。他眼尖，耳朵也尖。因为耳朵尖，他能辨别各种语音的微小区别和变化，把它一一记录下来。因为眼尖，他能觉察出语言的结构与意义的微妙关系，写出像

《“打”雅》(YB207~215页)那种细致准确的文章来。在比较方言与北京话的语音词语时,他引用了一些粤语例子,我看都是正确的。

## 二

YA、YB这两本书,收集了著者40多年来(1945~1992)的文章。在半个世纪中,国内的汉语研究有了不少发展变化,著者的学说同样也自觉、不自觉地发生了某些发展变化。他早期的论调,要是拿来跟最近的比较,不见得处处都严丝合缝。观点有改变,理论有演进,我以为是好事。例如1946年他反对使用“主语、述语”这些名称(YA21~26页),但是到了1982年他就主张分析句子要先分出“主语—谓语”来(YA309~311页)。为了行文或说理方便,他逐渐采用了好些通用的术语。下文要讲著者的某些主张,那都是他近来的说法,早期的说法这里就不一一提出或考证了。

著者的工作,可以分为几类。

第一类是对某些词语、结构的考订诠释,这方面他的工夫下得特别深,别人难出其右。比方关于汉语的爱称和憎称,王力先生曾发表过文章,而且写得不错,但是他是粤语区人,就北京话来说,他那收集资料、分辨用法的本领比之著者无疑是瞠乎其后(YA160~166页)。在两本论文集中,这一类的文章有:(1)古代语法格式的考证,如古汉语人称代词无主格、领格、宾格之分(YA295~299页);汉语单词中有化石语素,如“凤”本指雄,“凰”本指雌,但在“凤凰”这个单词中,“凰”这个语素已失去雌性的意义(YA456~470页)。(2)现代某些词语(尤其是北京话词语)的词汇、语法特征,如“哥儿、哥儿俩、哥儿们”的用法(YA476~479页)，“跟”和“同”的异同(YA112~116页)。(3)现代汉语的一些特别的词形结构,如“看不见,找不着”(YB63~82页)。(4)过去语法书不常讲的结构,如有名词功能的动词,好比“这个人怕打”(YB83~86页);在名词

与名词之间可插个“不”字，如“钱不钱我倒不在乎”(YA137页)；用本词作附加语，如“他瘸腿都是打球打的”(YA131~132页)。关于白话文所受文言文的影响，汉语所受外语的影响，现代汉语书面语所受江浙人的影响(YA244~250页)，著者也是留意最早者之一。对于以上问题，他烛幽发隐，对人们有启迪之功。

有些观点，著者提出较早，在当时也许是惊世骇俗的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已经变成大多数人的意见或者老生常谈了。例如：(1)汉字有很多缺点，必须改革(YA1~9页)。(2)口头语言是第一性的，书面语言是第二性的(YA357~358页)。(3)汉语语法有其特点，不能把印欧语法体系硬套在汉语上面(YA18~30页)。

现代汉语需要规范化，普通话要有个标准，可是拿什么做标准呢？在这方面，著者对自己和对一般人的要求不同。在行文时，他要求自己一字一句都严守北京话的(也许是老一辈北京人的)习惯。对于一般人，他可不那么苛求。他主张“用北京话作标准语，统一语音和语法，但是词汇必得吸收大量古代的、地方的和外国的才够丰富”，“而且语法限制也可以放松点儿”(YA155~159页)。

关于这个问题，北京地区的人和其他地区(尤其是吴语区、粤语区)的人至今还有分歧。我只想请大家留意，北京话虽然地位极高，可是它只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，并非完全等于普通话。北京话里边有些特殊的词语和语法习惯，还没有为全国人民所接受，这一点北京话专家徐世荣先生已经郑重指出了(请看《北京土语辞典》，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，10~12页)。一个人写学术性文章，要是坚持不用“除非”，必得用“错非”，不用“等等”，必得用“伍的”，那么京味足则足矣，可是一般读者要查方言词典才能懂。这样爱用罕见词语是否有利于传播知识，普及科学，只要找几个学生来试试就知道了。(小说、戏剧等文学作品有其风格上的特殊要求，不在此限，这里不谈)

谈到语法，著者有些断语是无人反对的。比方：(1)汉语句子的

主语不一定是施动者(YA190页)。(2)汉语句子并非每一个都有主语、谓语两个部分(YA197页)。(3)汉语动词表示施事、受事都用同一格式(YA197页)。(4)汉语形容词不像印欧语那样,没有什么比较级、最高级的形态(YA251~254页)。(5)“宾语”这个名称可用,但是要严格规定这不表示有什么动作“射向”宾语(YB59页)。

关于下面这两个问题,国内意见可能还不统一。(1)著者主张,分析汉语句子要先分出主语、谓语,不要一下子分为主一动一宾(YA309~311页)。(2)在区分词类时,著者认为应以重叠式为客观标准。第一项意见似乎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,至于第二个意见,著者已经补充说,这虽是客观标准,可不是区分词类的唯一标准(YA369页),料想也没有什么异议了。

“看得见、听得见、听不见、闻得见、闻不见”——这些是单词还是词组呢?著者认为是单词(YB63~82页),我赞成。在这些词形结构中,“得见”表示感官收到了信息,“不见”表示没收到;要是离开了“看、听、闻”,“得见、不见”都毫无意义。在这些单词结构中,“看、听、闻”是词干,“得见、不见”是后缀(也可以说“得、不”是中缀,“见”是后缀)。

汉语有形态吗?这又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。有人说没有,有人说非但有,还有狭义、广义之分。著者认为汉语有形态,但是形态这个术语指的是词的形态,“只有词的声音变化才叫形态变化”,至于一个词用在什么上下文里,不应该叫“广义的形态”,应该改称为语法环境(YA173~180页)。这个建议现在似乎已得到了公认。我觉得,在汉语中,形态应该专指词形,相当于英语的 morphology;至于句子中,一个词放在什么位置,与别的词有什么关系,彼此如何结合,这是句法范围里边的事,不要与词法混为一谈,还是称为语法环境较为妥当。

几十年来,国内语法学界受到美国结构主义的影响较大,多谈

形式和结构,少谈内容和意义。著者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异军突起,目光如炬。远在1946年,他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,语词只能代表概念,不能代表个别的感觉经验,所以同是一句话,听话人所理解的与说话人的原意往往不一致(YA13~15页)。这个说法非常精辟,已经直入语义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核心,比好多学者都先走了一大步。

### 三

下面提一些意见,请著者和读者大家考虑。

1. 一个句子该分为多少个部分?一般人分为主语、谓语两个部分,著者在一个地方也说,分析句子应先分出主语、谓语两个部分(YA311页),似乎与一般人的看法并无异议。但是另一个地方,他却说该分为“时间坐标、空间坐标、线索和核心”四个部分,他的根据是下面这个句子:昨日晌午呀,德胜门外头哇,一个老头儿啊,钓上来了一条10斤重的鱼。(YA192~195页)。

我不知道,著者眼下怎么看法?是分为两个部分,还是分为四个部分?如果是坚持要分为四个部分,他是否认为不能有第五、第六、第七个部分?要是句子里的状语与时间、空间无关,而与目的、原因、条件等等有关,他要把它归于哪个部分?

2. 在分析句子意义时,著者有个独特看法。他说,在“我打你,你打我”这些句子中,“打”字前的是前规定字,“打”字后的是后规定字,作用正好相反。前规定字是限制性的,缩小性的,它不会影响“打”的字典价值;后规定字是增加性的,扩张性的,它使“打”的字典价值大受影响。(YA29页)。

我对这个说法难以赞同。我认为,无论是前规定字也好,后规定字也好,既然对“打”字有所规定,那就是对它的“字典价值”(词汇意义)有所限制。

在“碗打了”中,“打”是弄破;在“刀打了”中,“打”是制成。前规

定字(即主语)限制了“打”的词汇意义。在“打油”中,“打”是买;在“打灯笼”中,“打”是提。后规定字(即宾语)同样也限制了“打”的词汇意义。由此看来,一个动词无论与主语结合也好,与宾语结合也好,都会影响动词的词汇意义。

3. 无论什么语法书,总要建立一个体系,定下若干范畴,说这是单词,那是词组,这是动词,那是形容词,等等。YA、YB 也不例外。但我们要是像著者那样爱刨根问底,人们就得问,这些语法范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这个范畴与那个范畴之间,是否有一条绝对的界线?

谁都知道,白天与黑夜之间难以划出一条绝对界线,青年与中年之间也难以划出一条绝对界线。同样,语言形式也有不少中间现象、过渡现象,难以截然分开。“说清”是一个词,“说清楚”可以说是一个词或两个词,“解说清楚”可还是认为两个词好些。“速度”是一个词,“高速度”是一个词组,但是在“列车高速度前进”中,“高速度”虽则仍然可以说是一个词组,可是不如说是一个单词更为妥当。

动词与形容词是不同的词类;只是一个词,没有上下文,“长”和“贵”谁都把它归入形容词类,决不会说是动词。可是在“兔子尾巴长不了”,“这儿的核桃贵不了”中,这两个词可以说是形容词,也可以说是动词(YB81~82 页)。

把语法范畴看成一些密封舱,风吹不进,水泼不入,不如看成一些临时储藏室,用隔扇分隔开来。隔扇有隔离作用,有了它,人们就可以分出 A 室、B 室、C 室来,觉得分门别类,各有专司。但是隔扇安上了窗棂,各室彼此之间还是通气的。非但如此,各储藏室里边那些东西,虽则经过整理,还是杂七杂八,安排得仍然不大整齐。

4. 对于同一事物,不同的人由于出发点不同,往往有不同的评价。汉字就是如此。

从追求高精密度的语音学家看来,汉字真是“坏透了,坏透

了”，因为它标音不准确，书写起来又很困难。可是从讲求实用的社会语言学家看来，汉字可是“好极了，好极了”，因为它是汉族人大多数都懂得的，因而在表情达意、记事通信方面是个极为便利的工具。YA10 页有个文题——“语言与文字的失真性和独立性”。用汉字写，这个题目并不难懂；要是改用拼音方案，写成 Yuyan yu wenzhi de shizhenxing he dulixing, 100 个中国人准保有 95 个不明白。

假使大陆废除了汉字，改用汉语拼音方案，台湾也废除了汉字，改用国语罗马字，海峡两岸之间如何沟通？况且，海外还有华侨 5000 万，他们都关心祖国。假使人们改用拼音文字，他们看得懂我们的文告书报吗？

著者说，“我们得……设法把文字改得接近拉丁系统，让我华夏之族有一套增进互相了解的工具”（YA16~17 页）。这话是 1949 年说的，可以理解，可是今天还该这样说吗？

#### 5. 最后一个问题——语法与修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？

吕叔湘和朱德熙两位先生合写了《语法修辞讲话》，著者却反对把语法修辞合开一门课（YB164~172 页）。依我看，两种做法都有理由。

理论上，语法和修辞各有其目的，是不同的学科；事实上，二者犬牙交错，是交叉性的研究。在一定范围内，这两门学科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因为都想教人们怎么做到文从字顺，词明意达。

别的不说，只在 YA、YB 两本书中，有不少地方就是既讲修辞，又讲语法的。《我听着别扭》（YA251~254 页）是一个突出的例子。

非但如此，著者的文章中某些部分就是绝好的修辞范例。好比《〈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〉前言》（YB4~12 页），本身是语言学论文，可是其中有些地方讲到著者与陆志韦的师友因缘，话说得那么素朴单纯，不加修饰，同时又那么情感充沛，真挚动人，真是情文并

茂，白描高手。谁要是说语言学家的文章总是干巴巴的像锯屑一般，我要请他花半个钟头工夫，好好地读一下这篇至情至文。



## 30年代青年语言学家白涤洲

曹述敬

我国30年代有一位青年语言学家，在音韵学方面做了许多切实的研究工作，总结出一些精当的条例；为人热诚笃实，尽心学术，疲累致死，寿无四旬！这就是白涤洲。

### (一)

白涤洲名镇瀛，涤洲是他的字。先世出自蒙古济特氏，清代隶镶蓝旗，辛亥革命后取姓白。白涤洲1915年16岁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，1921年毕业。他跟老舍（舒庆春）是同学和好友。白涤洲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，曾任京师公立第17及第7小学校长，都是接替老舍的。后来，他曾在北京教育会里作干事，也是接替老舍。1918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（后改称“注音符号”）。1919年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，会员来自三个方面：一是由教育部指派的，有黎锦熙、陈懋治、沈颐、钱稻孙等41人。二是由教育部直辖学校推选的，有钱玄同、胡适、刘复、周作人、马裕藻等35人。三是由会陆续延聘的，先后有赵元任、汪怡、蔡元培、白镇瀛、方毅、肖家霖、沈兼士、黎锦晖、许地山、林语堂、王璞等38人（据黎锦熙《国语运动史纲》83页，商务印书馆）。白镇瀛大约是在1920年应聘的，这时他才二十一、二岁，可能是最年轻的会员了。1920年他入国语讲习所研究国语国音，结识了黎锦熙，他们两人在有关“国语运动”的工作和学术研究，以至生活方面有了很深的关系。罗常培在《白涤洲小传》中说：白“在国语讲习所，以头脑之精敏，平语之流利，故成绩斐然，为侪辈冠。黎劭西（锦熙）先生引为青年同志，约其共同戮力国语运动。此后15年间，关于国语国音之讲习，讨论，宣传，视察，编辑，君